

家庭策略研究的方法论

——中国城乡家庭的一个分析框架

樊 欢 欢

Abstract: The author explains two prime concepts such as “family strategy” and “family problem” in the work of western scholars in this article. A review of main research interrelated with family strategy is provided. Three mainstream theories in the field of family sociology (theories of family ecology, family stress and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claim that individual-family-society has a relationship of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action. Scholars investigat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of the ac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family strategy and social change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Process-event analysis” advanced by the Chinese scholar enlightens the research of family strategy.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 above, this article forms the frame of family strategy research of the families in the cities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The research will be carried out from some points: the shaping process of family strategies in a family, instant condition and social context impelling family strategies to form, life course of family members,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trategies, the subtle influence of daily life strategies.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回顾

家庭策略 (family strategy) 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家庭史的研究, 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工业化过程中家庭的作用, 研究家庭面临新的外部环境时的决策过程。家庭策略在这里被解释为家庭及其成员的决策过程和时机, 如何时让孩子离家谋生, 何时更换住所, 何时控制家庭规模, 实施节育措施等。学者们试图利用个人日记、信件等材料去推断人们的家庭行为模式。丹尼尔·史密斯从一个家庭最后一个孩子的性别推断 19 世纪早期新英格兰的节育策略; 从同期的婚姻登记和遗嘱推断出父母对子女婚姻的控制策略。对家庭策略的研究是家庭决策的表现, 谁在家庭决策中起主导作用? 各个家庭成员在决策过程中分别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什么方式最终影响了家庭策略? 考察这类问题可以从中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家庭的性质, 进而理解家庭对社会的影响。近年来西方学者在对东方和西方的家庭研究中普遍注意到家庭决策决不仅仅是一种相互商量和民主的过程, 其中充满了支配与被支配、充满着夫妻争执和父母与子女的争论。对家庭策略的研究加深了对个人、家庭和社会变迁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家庭不是被动地受社会变迁的影响, 而是以自己原有的特点对社会作出反应, 这种反应的结果是家庭各成员之间的合力, 合力的方向或家庭策略的取向取决于各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 因此, 家庭的性质又必然影响社会的变迁 (张永健, 1993)。

家庭策略是针对家庭问题 (family problem) 提出来的。家庭问题的概念由来已久, 对它的

研究可追溯到五种理论来源:1. 家庭和社会问题;2. 家庭危机和调适;3. 常规的家庭发展;4. 小群体内问题的解决;5. 组织的决策(Bull, 1979)。家庭曾经被视为促使大规模社会问题产生的小环境。孔德曾描述离婚、违法行为等与家庭有关的问题,后来的研究注意了问题的社会结构起源对家庭生活的直接影响,细致地描述了家庭面临的广泛的问题。家庭危机和调适的研究同样集中于非灾难性问题,注重对家庭解体(family disorganization)的分析,与社会政策计划的应用紧密相连。与前者不同的是,它把家庭看作一个能动的主体,对所面临的问题能作出相应的努力,这体现在家庭对危机的反应及经历一段时期的混乱之后,家庭成员尝试重新获得秩序,为此引进了一些初步的互动概念。家庭发展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分析框架,区分出家庭要经历的许多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存在易产生问题的角色转换,如:新婚、为人父母、退休各阶段都需要进行调适。对小群体和组织内决策的研究则为家庭问题解决提供了丰富的结构和互动因素的细节,他们强调决策的角色,深入探讨了这一过程中的各个阶段。这些理论视角为当代学者提供了有力的研究传统。

20世纪发展起来的较为成熟的家庭社会学理论(或视角),如:家庭生态理论,生命历程研究和家庭危机理论,都从不同方面涉及到家庭的策略。

(一)家庭生态理论(family ecology theory)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世界性的人口增长、环境污染、能源损耗使人们开始关注人类生活与环境之间的互惠,对家庭的关注也扩展到非家庭的环境及其他系统,如:工业、商业、教育、健康等领域。由于生产功能移至家庭之外,家庭及其成员更多地被看作系统中的消费者,家庭生态理论这一流派集中探讨家庭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密执安州立大学教授比阿特里斯·布鲁斯(Beatrice Paolucci)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在《家庭决策》(Family Decision-making)一书中,他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对影响家庭决策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家庭的生态系统由三方面组成,有机体(organisms,指家庭成员)、环境(environment,自然的或人工建构的)和家庭组织(family organization,它通过对信息的运用将能量转化为家庭的决策和行动)。有机体和环境之间是互惠的关系,它强调那些家庭成员和环境互动、互相关联而产生的决策点(decision point);家庭组织在二者之间起调节作用。调控系统(regulatory system)由人所创造,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控制,它通过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教育、家庭诸系统以及生产、消费、社会化的过程,指导物质—能量和信息在人和环境之间的流向。在家庭内部,成员有时是互惠的,无法独自行使功能,有时又是独立的,但被由家庭互动形成的价值取向所影响。家庭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根源于每个成员的遗传基因和心理发展,一定程度上由塑造家庭价值体系的社会交换网络所形成。各个成员的需要和价值观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一个家庭的价值取向,成为家庭决策的基础。决策涉及到决策者之间的互动,特定的决策环境,对多种可能的决策进行选择的原则,最后的决定不仅来自于价值观和目标的协调,还要考虑到每种行动方式所涉及到的资源。谁来充当决策者取决于家庭中的角色期待,其依据是个人的年龄、性别、办事能力、经济实力,有的决策是多人参与的,一人为主也要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因此决策的效度依赖于两个因素——性能(quality)和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Paolucci等,1977)

(二)生命历程研究(life course research)

生命历程研究的复兴始自60年代,作为一个理论视角,它将个人所经历的生命事件放在长程的生命过程中来理解。比较其他方法,特点有:其一是强调多种时间背景对于人的发展的重要性,主要包括个体发育时间、代际时间、社会历史时间。其二,强调社会背景对理解个体生

命和发展的重要性。体现在: 1. 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影响个人发展, 2. 个人是积极的行动者, 与社会环境和结构相互影响, 3. 认识到不断变动的社会环境的不连续影响, 4. 强调发展的微观和宏观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三, 生命过程视角注重过程 and 变化, 以动态而非静止的眼光研究生命和家庭。最后, 它认为不同个体的发展在结构和过程方面存在差异性 (Bengtson 等, 1993)。由于家庭被视为经济、社会变迁和个人生活之间的重要媒介, 生命历程研究与家庭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战后, 家庭生活成为生命历程研究的一个主要关注点。

80 年代, 研究者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对“密执安收入动态追踪研究”(PSID) 的数据进行深入研究, 沿着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思路, PSID 建立了一个关于经济变迁和家庭适应之间互动关系的生命历程模型。其基本结论是: 经济困难有助于激励家庭成员到社会中主动寻求增加收入的机会, 在家庭内部, 经济困难迫使家庭通过增加或减少家庭成员等手段来改变家庭结构, 以此增加家庭适应社会的能力, 家庭适应性的增强又反过来改善了家庭应付暂时困难的能力 (李强等, 1999)。这便是从生命历程的角度对家庭策略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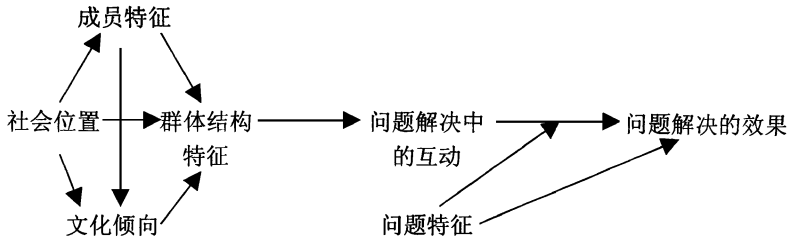
生命历程理论的一些基本原则对家庭策略研究很有启发意义。首先, 它强调个人与社会的交融关系, 认为社会结构的变化与人们生活的变化在实践中是相互交杂的动力机制, 离开彼此都不能被理解。如, 对萧条时期儿童成长的研究, 就将宏观变迁和具体个人经验相联系。其次, 重视个人主观能动性, 在历史和社会环境的机遇和限制中, 个人采取选择性行动以建构他们的生命历程 (刘亚秋, 1999)。哈芮文 (Hareven) 应用生命历程视角将家庭看作应对变化的积极的能动者, 她对曼彻斯特纺织工人的研究探讨了作为工厂和家庭之间媒介的亲戚关系。在这里, 亲戚充当了重要的掮客角色, 他们为在加拿大的亲戚提供雇佣的信息, 根据工厂的需要调节国家之间人力资源的流动。在移民家庭融入新环境的过程中, 亲属网发挥了维持传统家庭结构的功能。家庭训练成员适应工业劳动, 同时为他们在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挫折提供缓冲, 在这一过程中, 家庭发展了自己的防御机制, 使其文化传统与工作过程、工厂中的人际关系相适应 (Hareven, 1982)。哈芮文研究的重要性在于这些家庭不是社会变化的被动承受者, 而是协调社会-历史事件的积极能动者, 帮助家庭和其成员应对外在于他们的事件和环境。

(三) 家庭危机理论 (family stress theory)

家庭危机理论始自 1949 年茹本·黑尔 (Reuben Hill) 的研究, 他由对战争所造成的分离和团聚的个案研究, 构建了著名的 ABCX 概念框架。A 指造成危机的事件, B 指该家庭面对危机的应对能力, C 指该家庭对事件所做的评价, A、B、C 相互作用, 最后产生 X (家庭危机)。造成危机的事件可能是内在的, 如家庭成员的身体、生理状况, 人格条件, 家庭的经济条件, 社会条件, 结构条件, 及家庭功能出现障碍。也可能是外在的, 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如自然灾害,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变迁。以社会条件为例, 急速的社会变迁, 工业化、都市化现象, 人口的激增, 地域移动, 阶层移动, 都可能诱发家庭危机; B 因素包括家庭统合、家庭适应两方面。家庭统合指通过家庭生活所孕育的凝集与结合的一个纽带, 最显著的表现是: 家庭成员的共同兴趣, 爱情, 经济的相互依存感。家庭适应指遇到危机时家庭所具有的改变路径的能力; C 因素一般指家庭对危机现象的立即反应, 其中主观判断占了很大的比重, 这种判断一部分反映出家庭所拥有的价值体系, 一部分反映出危机经验, 另一部分则反映出对事物的评价方式。面对同样的危机, 各个家庭赋予事件的意义不同, 如不良青少年因偷窃被捕, 在一个社区会使家庭蒙受耻辱, 在另外一个社会团体则可能博取声誉 (林显宗, 1995)。

戴维·克雷思 (David M. Klein) 等人综合以往研究成果, 提出了更为完整的“家庭问题解

决”变量模型。该模型包括以下几个主要的变量：问题解决中的互动（problem-solving interaction）、问题的特性（characteristics of problem）、群体结构特征（group structure properties）、家庭成员的人格特征（member characteristics）、社会位置（social placement）、文化倾向（culture orientation），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了决策的效果（problem-solving effectiveness）。如图：



其中，问题解决中的互动涉及：语言交流及非语言交流的数量，对解决方式的创新性，语言符号的丰富性，对一决策支持或反对的数量，决策权力的集中性和合法性，决策人的说服鼓动力，决策者与其先赋和自致能力的相关性。家庭结构特征包括：家庭整合（角色期待、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家庭凝聚力），特征的分布（家庭成员年龄、性别、能力上的分布），发展变量（家庭生命周期、家庭规模、应对个人成长历程时家庭作出相应变化的灵活性）。文化倾向包括：控制感（环境被视为可知、可信和可控制的程度），行动的自我满足程度，对家庭成员意见差异的包容性。成员特点包括：信息加工的复杂性（信息的数量和加工规则的数量），解决问题的动机，自尊心。社会位置包括：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社会的复杂程度（信息加工的复杂性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Bull, 1979）。以上诸因素之间复杂的相关性，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解释框架。

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来看，从“大事件因果关系”转向“小事件因果关系”是社会学与传统哲学之间的一次断裂。在传统的大事件因果关系中，历史由一系列关节点构成，在这些重大的关节点上，历史的进程又往往取决于某些“关键人物”；这些重大事件与社会上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中心辐射模式”，处于中心的大事件决定着其他小事件的发展进程。“小事件因果关系”的出现颠覆了事件等级制，小事件开始成为分析的核心。理论家采用各种不尽相同的理论策略来理解小事件以及它们和抽象的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一种可称为“表面效果”（surface effect）的研究策略拒绝在社会现象的背后寻找一个有机体或一成不变的“社会结构”，事件被认成对个人乃至社会产生了独一无二的影响，并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历史和社会历史。任何一个事件总是作为关系被把握，而任何一种关系又并不是化简为结构，而总是将之视为事件，这就是德勒兹所一再强调的“关系/事件”的基本意涵。而传统的结构社会学和行动社会学在分析过程中都运用了某种化简事件的方式，前者将事件化简为结构，而后者将事件化简为行动，这种化简事件的方式就其核心而言与社会学长期以来对时间问题的简单化理解密切相关。因此，真正的事件社会学必须以对时间的深刻理解为前提（李猛，1997）。

孙立平教授提出以“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来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农民有他们独特的思维，关系的亲疏远近从称谓上是反映不出来的，只有当“有事情的时候”才能看出谁远谁近，这种“有事情的时候”就是一种可以展示事物逻辑的事件性过程。关注、描述、分析这样的事件与过程，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动态的解释，就是“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其基本点是力图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它

强调一种动态的描述风格,将研究对象当作一个事件性过程来描述和理解,以揭示其中更为微妙的逻辑和机制。这一研究策略是对传统社会事实定义的一个突破,社会事实不再被看作固态静止的,而是鲜活的、流动的,在动态中充满着种种“隐秘”。从社会互动的角度看,“过程-事件分析”中相联系的事件之间互为场景或情境是动态的、历时性的,这样便将历史的因素注入到社会互动的过程之中。(孙立平,1999)

二、分析框架

因此,从以往关于家庭策略的研究及相关文献中,我们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启迪。

第一,家庭策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将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与家庭成员互动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视角和机会。从家庭史的研究看,家庭策略表明家庭不是被动地受社会变迁的影响,而是“以自己原有的特点对社会作出反应”,也就是说,它体现了家庭对社会的反作用。而它作出反应的前提,则是社会变迁这种社会对家庭的作用,这正是我们想了解的。其次,家庭策略的研究使我们关注家庭决策的产生过程,因而也必须关注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及在互动中体现出来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第二,这样的一种研究特色决定了我们必须使用一种综合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从变动、相互联系和个性与共性的结合这一视角去把握家庭策略的产生和执行。所谓变动,就是把家庭策略的决定和实施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首先它产生于家庭成员的互动,其次,它会随社会的变动而改变,因此,它在与社会不断的相互作用中实施与完成。在实施过程中,家庭日常生活中哪怕是每一个小小的决策,都会从属于既定的家庭策略从而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系列。另外,单个家庭的家庭策略固然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但是作为“类”的家庭(比如工人家庭、农民家庭、知识分子家庭)也会表现出其共性,所以我们可以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去达到对家庭策略的产生机制的一般过程及其对社会作用的认识,也可由此窥视在家庭策略制定过程中,人际互动中反映出来的由社会变迁导致的家庭关系的变化,及这种变化所具有的家庭制度变迁的性质。

因此,由以上对家庭策略的研究中所体现的家庭策略的原意,我们在这里将家庭策略界定为当家庭面对社会变迁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它体现在一系列的彼此联系的家庭决策中。在我们的家庭策略研究中,大致有以下几个关注点:

(一)家庭策略的形成过程,即谁在家庭策略的形成中起主导作用?各个家庭成员分别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什么方式最终影响了家庭策略的形成,显然,这里我们想考察的是家庭策略的形成机制及在它形成中反映出来的家庭成员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会因为地区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而成为比较研究的前提。

(二)家庭策略形成的基础。这涉及到家庭策略产生时的环境,即当时一个即时的情境及与此有关的社会背景。大的社会背景指社会变迁,即时情境则指家庭成员生活于其中的家庭所具有的价值和规范,也包括家庭成员的心理所构成的一个氛围。这里我们尤其关注的是由社会和家庭主要成员(夫妻)个人的价值观所型塑的家庭的价值取向。

(三)家庭策略的成因。这与家庭成员个人的生命过程密切相关。因为正是个人不同的生命轨迹导致了在形成家庭策略时的不同的职业、社会地位和价值取向,这有可能导致不同的家庭面对相同的社会变迁采取不同的家庭策略;另一方面,对形成家庭策略有主导作用的主要家庭成员的个人能动作用,在采取选择性行动以形成其特有的家庭策略方面的影响也不能忽视。

(四)影响家庭策略的其他因素。这部分地与家庭成员个人的生命过程有关,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如家庭策略形成过程中的互动、家庭结构的特征、家庭成员的人格特征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从而使家庭策略的形成过程呈现不同的特点,也使不同家庭的家庭策略的实施呈现出一种多样性和复杂性。

(五)家庭策略实施的结果。这里倾向于认为已经形成的家庭策略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在一个时期中会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家庭决策则都从属于这一策略从而形成一个彼此互相联系的过程,同时又表现出一种整体的特性。这样的决策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规决策,比如消费;另一个是家庭遇到突发事件时所采取的决策,这也会与家庭策略有关。

(六)日常生活与重大决策的连属性。“过程-事件分析”研究视角使我们得以摆脱将日常生活与重大事件截然分开的分析方式,而将具转折意义的家庭决策还原回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从细微之处体察家庭在面临关键性抉择时看似意外、实际必然的做法,也就是说,重大决策并非突生于日常生活,所谓家庭策略是一个前后相继、绵延不断的过程,生活中每一个小的决定都反映并构成了总体的家庭策略。

参考文献:

- 李猛, 1997,《迈向关系一事件的社会学分析:一个导论》,《国外社会学》第1期。
- 李强、邓建伟、晓箏, 1999,《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林显宗, 1995,《家庭社会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 刘亚秋, 1999,《生命历程理论综述》,北京大学96级本科生毕业论文。
- 孙立平, 1999,《“过程——事件分析”与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洞察》,《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
- 张永健, 1993,《家庭与社会变迁——当代西方家庭史研究的新动向》,《社会学研究》第2期。
- Bengtson Vern L. & Katherine R. Allen 1993 “The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Applied to Families over Time”, *Sourcebook of Family Theories and Methods: A Contextual Approach*, Plenum Press.
- Bull, Wesley R. 1979, *Contemporary Theories about the Family*, Free press.
- Hareven, TK. 1982, *Family Time and Historical Ti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ubbin, Hamilton I. & Joan M. Patterson, 1983, “Family Stress and Adaptation to Crisis: A Double ABCX Model of Family Behavior”, *Family Studies Review Yearbook*, volume 1, Sage.
- Klein, David M. & Reuben Hill 1979, “Determinants of Family Problem-solving Effectiveness”, *Contemporary Theories about the Family*, Free Press.
- Paolucci, Beatrice; Olive A. Hall & Nancy Axinn 1977, *Family Decision-making: an Ecosystem Approach*, John Wiley & Sons.

作者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谭 深